

“言行一致”还是“投桃报李”？*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实际税负

邹 萍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内容提要: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在中国企业中的运用,这些研究仅将政府作为一个获取税收收益的利益相关者纳入研究框架,忽视了政治经济体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均呈负相关,而且相比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而言,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的负相关关系更强。这意味着企业明面上在积极主动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暗地里却在从事避税行为。结合中国的转轨经济背景,本文采用寻租理论解释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向地方政府寻租,地方政府则“投桃报李”地对企业在税收执法上放松,从而帮助企业降低实际税负。进一步结合中国的二元经济背景,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产权企业,私有产权企业寻租倾向更严重,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降低了实际税负,即进行了更加激进的避税行为,而且政治关联的存在强化了这种关系。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在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避税行为并存的经验证据,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与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解读。

关键词: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实际税负 寻租 产权性质 政治关联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8)03—0159—19

一、引言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于资本的渴求已经逐渐得到满足,转而开始意识到承担社会责任同样关系着企业未来的发展。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并且将这些信息传递出去,才有助于塑造其“遵纪守法,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好社会形象。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大抵沿袭了这一思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政府也日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近几年不断出台了许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规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于国于企都是十分重要的。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是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然而对企业而言,仅所得税一项就占到了其税前利润的四分之一。避税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现金支出,节省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企业有充分的动机通过各种方法进行避税。但是,对于社会而言,企业避税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削弱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最终降低了社会福利

收稿日期:2017-12-06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动态调整与优化对策研究”(17CGL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高管个人特征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2662015PY231)。

作者简介:(1984-),女,湖北襄阳人,讲师,会计学博士,研究领域是公司财务,电子邮箱:bignail1984@126.com。

(Tullock, 1989)^[1]。显然,不论是合法的避税,还是不合法的偷逃税^①,都是违背社会责任的行为(Slemrod 和 Yitzhaki, 2002^[2]; Chen 等, 2010^[3]; Hanlon 和 Heitzman, 2010^[4]; 范子英和田彬彬, 2013^[5]; 陈冬等, 2016^[6]; 李增福等, 2016^[7])。

企业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以展现其“负责任”的正面形象的行为理应与避税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相悖。现有的一些相关文献也认为,社会责任披露状况好的企业往往避税程度更低(Lanis 和 Richardson, 2012^[8]; Hoi 等, 2013^[9])。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直接借鉴西方传统理论(主要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对象也主要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研究中国企业问题离不开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因此,这些结论未必与中国的现实相符。本文发现,披露社会责任的企业实际税负比未披露的反而更低,且披露质量与实际税负负相关。这说明企业明面上在积极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暗地里却在避税。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意味着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并不完全是出于慈善的利他主义动机,而可能另有所图。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能够对此提供比较合理的解释。寻租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会产生多种形式的租金,企业会为了这些租金进行寻租(Krueger, 1974)^[10]。中国的制度环境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拥有强大的干预倾向和力量。中国的企业内生于这种制度环境之中,深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从2006年政府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开始,社会责任已经不再主要是企业层面自主行为的结果,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的体现(黎文靖, 2012)^[11]。企业通过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迎合政府的需求,而政府则“投桃报李”地通过放松税收执法力度以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来回馈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一定程度上沦为企业向政府寻租的工具之一,它帮助企业获取租金,即实际税负的降低。而且受中国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相比与政府有“天然血缘关系”的国有产权企业,私有产权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寻租倾向更严重。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基于寻租理论探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充分考虑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企业的影响;其次,提供了在转型经济国家中,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与避税并存的经验证据,揭示了二者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制;再次,丰富了非财务信息相关研究。本文发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有助于企业避税,且信息质量越高避税效应越强。最后,在如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日益受到政府重视的情况下,本文为监管重要还是动机重要的讨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制度背景

寻租理论认为,政府利用职权干预市场运行会导致少数群体或个人可以通过向政府寻租而获取特权,并因此获得租金,即超额收益(Krueger, 1974)^[10]。可见,寻租产生的重要前提是政府对市场存在干预和管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是,总体而言,距离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仍然有一定的距离,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强力干预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特征。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替代了市场的部分功能,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主导了部分经济活动,一些关键性资源及其价格处于政府强制性的计划管理之下,一些行业或领域的进入也受到了严格的管控和约束。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企业和政府难以有效分离,企业对政府依赖严重(Detomasi, 2008)^[12],这为寻租的产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

具体而言,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拥有较大公权力,掌握了许多经济发展所

① 避税和偷逃税的主要区别在于合法性,但是,在实证研究中,由于合法性的模糊,这两个概念经常是不进行区分的(Slemrod 和 Yitzhaki, 2002; 范子英、田彬彬, 2013),在具体的衡量上,主流会计文献通常从企业实际税负的角度来探讨企业避税程度(Chen 等, 2010^[3]; Hanlon 和 Heitzman, 2010^[4]; 陈冬等, 2016^[6]; 李增福等, 2016^[7]),本文亦遵从该做法。

需的稀缺资源(周黎安,2007)^[13]。地方政府权力巨大,对企业行为和所辖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能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政治不透明以及对行政权力缺乏一套足够行之有效的监管与约束制度,这为寻租提供了制度基础(Shleifer和Vishny,1994)^[14];另一方面,在“锦标赛”式的晋升机制驱动下,为了在短期内多出政绩,地方政府有较大动机利用权力干预企业行为与所辖地区的经济(周黎安,2007^[13];周黎安和陶婧,2009^[15]),这又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契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对政府控制的关键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在市场经济不健全的条件下,为了争取到政府手中的资源,寻租成了企业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为此,企业需要积极地构筑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尽力迎合政府的需求,替政府承担一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任务(Fan等,2013)^[16]。企业将在寻租收益和寻租成本间进行权衡,如果收益超过成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寻租。最终,政府和企业“各取所需”,实现寻租的目的。但是,寻租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行为,它的存在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降低了社会的整体福利,而且通常伴随着一系列的腐败行为,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在中国并不新鲜,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与社会责任思想高度契合的“义利之辨”。然而,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却比较落后,直到2006年才正式出台《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由于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相关的政策规范实施的时间比较短,再加上中国特殊的转轨经济背景,中国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和经济后果有其独特性,即不完全是市场驱动的自主行为,而是上升到一种政府意志的体现(黎文靖,2012)^[11]。从2006年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到2008年众多关于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规定的出台,再到2015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可以看出,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不再只是普通的社会问题,而是逐渐成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当社会责任问题被拔高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地方政府官员辖区内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以及信息披露状况就会成为其晋升的政绩指标之一。而且在中国特色的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在各个方面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Qian和Roland,1998^[17];Jin等,2005^[18];Li和Zhou,2005^[19])。如果当地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以及信息披露状况不佳,上级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就会对地方政府产生不满,进而对官员的晋升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出于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官员晋升的压力,地方政府需要当地企业积极主动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通过分析2001-2015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的变化趋势可知:2001-2005年五年的社会责任报告总数仅为24份,而在2006年出台《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后,仅2006年一年就发布了33份社会责任报告,到2008年政府进一步出台多项关于社会责任的规定后,社会责任报告上升到169份,到2015年更是飙升至1703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的变化显然和中央政府关于社会责任问题相关政策方针出台的时间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更多的是对政府意志的迎合,有可能成为一种比较隐蔽寻租的方式。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迎合了政府的需求,政府则会“投桃报李”地利用权力把关键资源倾向性地分配给这些企业作为回报。

回报之一就是给予企业避税收益。地方政府要想给予企业避税收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降低税率,以及提高税收优惠;另一种是降低税收执法力度。在中国,税收立法是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税种的立法权和解释修订权。因此,地方政府想通过第一种途径为企业降低税负非常困难。但是,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动用权力和资源迫使税务机关丧失独立性,使之屈从于地方政府的要求而降低执法力度(王立彦和刘向前,2004)^[20]。且地方政府通过降低税收执法力度来为企业提供避税收益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隐蔽性强,难以被上级政府发现(Cremer和Gahvari,1997)^[21]。因此,地方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通过降低税收执法力度来为企业减税(郭杰和李涛,2009^[22];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5])。中国审计署对企业纳税的审计报告中就特别指出,地方政府

对税收的执行不力是企业大范围避税的主要原因^①。所以,地方政府一方面具有对所辖地区内企业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报告的政治和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又具备干预税务机关执法的行政权力。这样,地方政府就有动机也有能力通过给披露了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放松税收执法来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这种由于税收执法力度下降所导致的企业避税行为相比其他避税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更低,企业避税的机会成本也大大降低,相应的避税收益得到显著提升,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来避税(Dubin等,1990^[23];Slemrod等,2001^[24])。

此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提高了社会对企业的信任,诱导税务部门低估这类企业避税的可能性,并降低相应的税务稽查的力度。由于现今中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以及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社会信任非但没有成为促进企业社会道德水平提高的积极因素,反而一定程度上被企业所滥用,成为企业的寻租工具,帮助企业进行避税活动(张茵等,2017^[25])。再加上税务部门人力物力有限,面对数目众多的企业难以做到对每家都逐一进行全面细致地稽查,就会选择性地对社会信任度高的企业降低税收稽查的力度。这样,当这类企业存在避税行为时,相比其他企业,不容易受到税务部门严厉地查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实际税负比未披露的企业更低。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推动了企业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沟通,让他们能更加直接、公开、真实地了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Reverte,2009)^[26]。企业提供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向市场传递出了企业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信号(宋林等,2012)^[27]。履行社会责任越好的企业通常也会倾向于更详细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以期获取更加积极的市场反映,强化企业的合法性(刘想和刘银国,2014^[28];权小锋等,2015^[29])。据调查,中国企业多数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存在“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其中详细披露负面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只占到全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数目的9.6%^②。这从侧面反映出提供高质量信息的主要是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出色的企业,同时也意味着这类企业更加积极地迎合了地方政府在社会责任方面的需求,地方政府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会在税收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避税收益,实现政企间的“互惠互利”。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₂:随着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上升,实际税负下降。

基于前面的分析,企业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有助于从地方政府获取更多避税收益,那么企业是否会出于这种寻租动机而自愿披露高质量的信息?企业自愿地将其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公之于众,是期望能够获取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同(刘想和刘银国,2014)^[28],有很强的目的性。社会责任信息作为一种沟通工具,相比决策价值,它的公共关系价值更加突出(Jenny Dawkins,2005)^[30]。研究发现,自愿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往往在内容及语言的选择上都会尽力传递出企业在积极履行责任的正面信息,有非常明显的公共关系目的(宋献中和龚明晓,2006)^[31],那些本身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出色的企业更是如此(权小锋等,2015)^[29]。但是,强制披露主要是出于政府强制的被动行为,并非自愿的政企互惠行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观能动性相对较低。因此,相比强制披露,自愿披露的企业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展示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有意识地提供高质量的信息以迎合地方政府的社会和政治需求,从而更容易获取地方政府给予的避税收益。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① 中国审计署.2004年第4号:788户企业税收征管情况审计调查结果[EB/OL].中国审计署网站 <http://www.audit.gov.cn/n5/n25/c63506/content.html>。

② 解读《白皮书》:2014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八大发现[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1/15/c_127389654_2.htm。

H₃: 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比强制披露的企业更愿意通过提高信息质量来降低实际税负。

在中国的二元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产权企业和私有产权企业在经营目标上存在一定差异,而且政府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的干预程度也有异,因此,二者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上有差异。国有产权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除了承担经济责任,还承担了国家赋予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政府代替人民行使对国有企业的权力。国有企业不但要获取利润,还要协助政府完成就业、提供公共服务和设施、维护社会稳定等任务,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国有产权企业要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要更积极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但这是出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以及人民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和政府进行“利益交换”。而且依法纳税以协助政府税收政策目标的完成本身也是国有产权企业的职责之一(吴联生,2009)^[32]。国有产权企业所肩负的多重责任弱化了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导致其避税倾向较弱。因此,国有产权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向政府寻租以获取避税收益的动机较低。而私有产权企业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实体,相比国有产权企业,其财务弹性较差,融资约束严重,在市场竞争中有明显的劣势(邓建平和曾勇,2011)^[33],所以具有较强的避税倾向。更重要的是,私有产权企业由于“出身”的原因,较难获取政府的关照与资源。为了获得政府的认同,私有产权企业有强烈的倾向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和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向政府寻租(Godfrey,2005)^[34]。研究发现,私有产权企业的寻租倾向显著高于国有产权企业(李四海等,2015)^[35],而且私有产权企业的名义所得税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税率的差异比国有产权企业更大,私有产权企业的避税倾向和程度都比国有企业更强(Cai和Liu,2009^[36];李元旭和宋渊洋,2011^[37])。因此,相比国有产权企业,私有产权企业会更积极地通过提供社会责任信息向地方政府寻租以获取避税收益。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₄: 相比国有产权企业,私有产权企业会更积极地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来降低实际税负。

基于前面的分析,企业会通过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向政府寻租以获取避税收益。那么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这种避税效应?拥有政治关联不仅有助于企业获取产权保护,更有助于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许多关照和稀缺资源(吴文锋等,2009^[38];田利辉和张伟,2013^[39])。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普遍地避税程度更高(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40];Kim和Zhang,2016^[41])。一方面,企业为了能够持续地从政府那里获取额外关照和稀缺资源,必须维持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要想维持甚至加深这种关系,就需要企业付出更多的代价,而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就是代价的一种;另一方面,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取更多关于政府的信息,能更好的把握政府的需求和意图,与政府间的互惠互利关系更加融洽。对于政府而言,政府对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同样了解更深入,往往期望也更高,对这类企业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自然更高,相应地,对这类企业也会更加“偏爱”,愿意给予其更多的避税收益。而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本身从资源上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就比较低,再加上缺乏对政府的需求和意图的深入了解,所以利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向政府寻租的动机不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₅: 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更积极地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来降低实际税负。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数据

本研究选取2009-2015年仅在沪深A股上市的公司为初始样本。以2009年作为起始年度是因为:至2008年,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要求部分企业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2009年沪深两市上

市公司正式依照此规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具体按照以下标准进行样本筛选：(1) 因为金融类企业的财务数据与非金融类企业的财务数据有较大差异，所以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2) 剔除 ST 上市公司样本；(3) 剔除总资产负债率小于 0 或大于 1 的上市公司样本；(4) 剔除所得税费用为负以及利润总额为负的上市公司样本 (李维安和徐业坤, 2013)^[40]；(5) 剔除主要变量有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最终经过上述筛选过程，共计删除了 5110 个样本，得到 11211 个样本，其中，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样本有 2517 个，没有披露的样本有 8694 个。此外，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研究对所有连续变量在总样本上下 1% 的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数据的来源具体如下：基本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内的公司研究系列数据库，社会责任信息数据通过国泰安数据库内的社会责任研究数据库加上手工搜集整理获得，适用所得税税率来自于 Wind 数据库。

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建立以下两个回归模型：

$$Tax_{i,t} = \alpha_0 + \alpha_1 CSRDIS_{i,t} + ControlVariable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

$$Tax_{i,t} = \alpha_0 + \alpha_1 CSRQUA_{i,t} + ControlVariable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Tax 为企业实际税负； $CSRDIS$ 为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CSRQUA$ 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Control Variable$ 为一组控制变量的向量组； $\sum Industry$ 为行业虚拟变量，用以控制行业效应； $\sum Year$ 为年度虚拟变量，用以控制宏观环境因素。模型 (1) 用于验证假设 H_1 ，重点考察 $CSRDIS$ 的系数 α_1 的符号。模型 (2) 用于验证假设 H_2 ，重点考察 $CSRQUA$ 的系数 α_1 的符号。

在以往的文献中，企业实际税负 (Tax) 主要采用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和所得税费用的“账税差异”这两个指标来衡量 (Dyreg 等, 2010^[42]；刘行和叶康涛, 2013^[43]；魏春燕, 2014^[44])。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 ($ETR1$) 即企业当年发生的实际所得税费用与税前利润之比，该指标越小，表明企业实际税负越低，避税程度越大。所得税费用的“账税差异” (TRD) 即企业的适用所得税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税率的差异，差异越大，表明企业避税程度越大，该指标对于企业的避税行为进行了较深刻的刻画，提高了各公司避税程度的可比性。这两个指标都能够比较有效地反映企业避税程度，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只能衡量企业对于所得税的避税程度，而忽视了对于其他税种的避税情况。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企业的总体税负避税程度，同时确保研究的稳健性，本研究还采用了第三个指标 $ETR2$ ，该指标为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总和扣除收到的税费返还除以营业收入，数值越小，表明企业的总体税负的避税程度越大。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CSRDIS$) 为虚拟变量，企业当年披露了社会责任信息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关于社会责任信息质量 ($CSRQUA$)，由于社会责任行为本身涉及多个维度，再加上社会责任信息多以文字的形式报告，难以量化，导致理论界一直缺乏统一、权威的度量其质量的方法。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被界定在“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之上，满足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企业就承担了社会责任 (Clarkson, 1995)^[45]。因此，评价一个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是否披露了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以及信息是否真实可靠。本研究选取国泰安数据库中社会责任研究子库中“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基本信息表”中的 12 个方面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基本标准^①，这 12 个方面不仅囊括了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几乎所有方面，同时衡量了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规范性。本研究将这 12 个方面的标准进行 0~1 赋值，比如披露了该利益相关者信息的赋值为 1，否则为 0；经过第三方机构检验

① 具体包括：是否经第三方机构审验；是否参照 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是否披露股东权益保护；是否披露债权人权益保护；是否披露职工权益保护；是否披露供应商权益保护；是否披露客户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否披露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是否披露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制度建设和改善措施；是否披露安全生产内容；是否披露公司存在的不足。

的赋值 1, 否则赋值为 0。然后, 将每家公司的这 12 个标准得分进行加总, 得分区间在 0 ~ 12 之间, 为了使数据更加利于研究, 进一步将之除以 12 使得取值标准化, 最终得到社会责任信息质量 (CSRQUA) 的衡量指标, 该指标越大, 说明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越高。

参考 Dyreng 等 (2010)^[42]、Hoi 等 (2013)^[9]、刘慧龙和吴联生 (2014)^[46] 以及李增福等 (2016)^[7] 的做法, 控制了以下变量: 公司规模 (SIZE)、财务杠杆 (LEV)、公司成长性 (GROW)、股权集中度 (SHRCR1)、股权制衡 (ZINDEX)、独立董事比例 (INDEP)、资产报酬率 (ROA)、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PIS)、固定资产比例 (PPE)。具体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实际所得税税率	ETR1	实际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总额
适用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	TRD	适用所得税税率 - 实际所得税税率
总税负的实际税率	ETR2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收到的税费返还)/营业收入
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CSRDIS	如果企业当年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取值为 1, 没有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取值为 0
社会责任信息质量	CSRQUA	根据 CSMAR 社会责任数据库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指标打分, 并标准化处理后获得(具体度量方法见上文)
公司成长性	GROW	营业利润增长率
财务杠杆	LEV	总负责/总资产
公司规模	SIZE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股权集中度	SHRCR1	公司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
股权制衡	ZINDEX	公司第一大流通股股东与第二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
资产报酬率	ROA	利润总额/总资产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PIS	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和
固定资产比例	PPE	固定资产/总资产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企业实际税负变量: 实际所得税税率 (ETR1) 均值为 0.202, 表明样本公司的平均实际所得税税率为 20.2%, 低于我国最高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 25%, 说明我国不少企业都对企业所得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避税, 符合我国的现状; 适用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 (TRD) 的均值为 -0.004, 标准差为 0.122; 总税负的实际税率 (ETR2) 的均值为 0.068, 说明样本公司的平均实际总税负为 6.8%, 标准差为 0.063。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变量: 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CSRDIS), 均值为 0.225, 这表明有 22.5% 的样本公司披露了社会责任信息, 标准差为 0.417; 社会责任信息质量 (CSRQUA), 均值为 0.642, 标准差为 0.123。其他变量方面: 成长性 (GROW) 的均值高于中值, 说明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占到了多数; 财务杠杆 (LEV) 的均值与中值分别为 0.434 和 0.432, 说明样本公司的财务杠杆大概控制在 40% 左右; 股权集中度 (SHRCR1) 的均值为 22.28, 说明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为 22.8%, 符合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较为集中的特点; 股权制衡 (ZINDEX) 指数均值达到 11.3, 进一步说明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结构特征下股权制衡也非常弱;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的均值为 0.37, 说明样本公司的独立董事人数占比都达到了证监会要求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TR1</i>	0.202	0.172	0.128	0.001	0.803
<i>ETR2</i>	0.068	0.055	0.063	-0.055	0.317
<i>TRD</i>	-0.004	0	0.122	-0.602	0.244
<i>CSRDIS</i>	0.225	0	0.417	0	1
<i>CSRQUA</i>	0.642	0.667	0.123	0.083	0.917
<i>GROW</i>	0.183	0.065	2.267	-9.074	14.73
<i>LEV</i>	0.434	0.432	0.210	0.047	0.864
<i>SIZE</i>	21.98	21.80	1.236	19.70	25.88
<i>SHRCR1</i>	22.28	18.47	18.42	0.350	69.97
<i>ZINDEX</i>	11.30	3.310	20.33	1.001	126.2
<i>INDEP</i>	0.370	0.333	0.053	0.308	0.571
<i>ROA</i>	0.048	0.038	0.048	0	0.241
<i>PIS</i>	0.398	0.408	0.235	0	0.882
<i>PPE</i>	0.226	0.192	0.166	0.002	0.722

资料来源：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实际税负

前文的理论分析认为,地方政府需要当地企业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来满足其社会与政治需求,因而企业可以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向政府寻租,从而获取租金,即更多的避税收益。为此,本文对假设 H_1 进行了实证检验。表 3 列示了假设 H_1 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CSRDIS*) 与所得税实际税负 (*ETR1*)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系数为 -0.004 , 显著性水平为 10%), 与适用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 (*TRD*)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系数为 0.006 , 显著性水平为 10%), 与总税负的实际税率 (*ETR2*)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系数为 -0.003 , 显著性水平为 5%)。同时,分别将列(1)和列(2)进行对比,列(3)和列(4)进行对比,列(5)和列(6)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相比没有加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变量 (*CSRDIS*) 的模型,加入该变量模型的调整后 R^2 有所提高,即模型拟合优度提高,从侧面说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实际税负构成了影响。这些结论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相比没有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实际税负下降,即有明显的避税行为。这证明企业以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作为寻租手段迎合了地方政府对所辖地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而地方政府则通过放松对企业的税收执法力度来对这类企业予以回报。企业因此而获得租金,即有机会从事更加激进的避税行为,获取更多的避税收益。结论支持假设 H_1 。

表 3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实际税负

变量	(1)	(2)	(3)	(4)	(5)	(6)
	<i>ETR1</i>	<i>ETR1</i>	<i>TRD</i>	<i>TRD</i>	<i>ETR2</i>	<i>ETR2</i>
<i>CSRDIS</i>		-0.004^* (-1.679)		0.006^* (1.857)		-0.003^{**} (-2.231)

续表 3

变量	(1)	(2)	(3)	(4)	(5)	(6)
	<i>ETR1</i>	<i>ETR1</i>	<i>TRD</i>	<i>TRD</i>	<i>ETR2</i>	<i>ETR2</i>
<i>GROW</i>	-0.003 *** (-5.967)	-0.003 *** (-5.946)	0.003 *** (5.715)	0.003 *** (5.683)	0.000 (0.519)	0.001 (0.557)
<i>LEV</i>	0.099 *** (13.843)	0.010 *** (13.89)	-0.071 *** (-9.880)	-0.072 *** (-9.978)	-0.051 *** (-15.960)	-0.051 *** (-15.79)
<i>SIZE</i>	-0.001 (-0.520)	-0.001 (-0.886)	0.003 ** (2.126)	0.003 *** (2.626)	0.002 *** (4.528)	0.002 *** (3.517)
<i>SHRCR1</i>	0.000 *** (3.651)	0.000 *** (3.569)	-0.000 ** (-2.231)	-0.000 ** (-2.109)	-0.000 (-1.629)	-0.000 * (-1.767)
<i>ZINDEX</i>	0.000 *** (4.272)	0.000 *** (4.317)	-0.000 ** (-2.306)	-0.000 ** (-2.381)	-0.000 (-0.413)	-0.000 (-0.321)
<i>INDEP</i>	0.033 (1.521)	0.032 (1.495)	-0.004 (-0.165)	-0.003 (-0.126)	0.021 ** (2.219)	0.021 ** (2.172)
<i>ROA</i>	-0.370 *** (-14.573)	-0.372 *** (-14.62)	0.352 *** (13.891)	0.355 *** (13.98)	0.271 *** (23.826)	-0.269 *** (23.64)
<i>PPE</i>	0.006 (0.776)	0.007 (0.772)	0.008 (1.038)	0.009 (1.044)	-0.007 * (-1.822)	-0.007 * (-1.830)
<i>PIS</i>	-0.036 *** (-4.712)	-0.036 *** (-4.710)	0.031 *** (4.103)	0.031 *** (4.099)	0.012 *** (3.408)	-0.012 *** (3.413)
<i>Industry/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0.189 *** (7.073)	0.199 *** (7.082)	-0.027 (-1.011)	-0.043 (-1.547)	0.045 *** (3.768)	0.054 *** (4.281)
<i>N</i>	11211	11211	11211	11211	11211	11211
<i>Adj. R²</i>	0.152	0.155	0.063	0.068	0.252	0.299
<i>F</i>	62.84	61.98	25.24	24.58	148.9	144.6

注: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修正的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

前文已证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有助于企业避税,那么企业是否会通过提高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来更深层次地迎合地方政府的需求,从而有助于企业进行更加激进的避税行为?为此,本文对假设 H_2 进行了实证检验。表 4 列示了社会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的回归检验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信息质量(*CSRQUA*)与所得税实际税负(*ETR1*)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系数为 -0.177,显著性水平为 1%),与适用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TRD*)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系数为 0.169,显著性水平为 1%),与总税负的税率(*ETR2*)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系数为 -0.001,显著性水平为 5%)。这些结论均表明,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越高,其实际税负越低,即避税程度越高。这说明,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避税收益,通过积极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迎合地方政府,以换取地方政府在税收执法上更大幅度的宽容。假设 H_2 得到验证。

表 4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

变量	(1)	(2)	(3)
	<i>ETR1</i>	<i>TRD</i>	<i>ETR2</i>
<i>CSRQUA</i>	-0.177*** (-2.834)	0.169*** (2.712)	-0.001** (-2.079)
<i>GROW</i>	0.003 (0.738)	-0.003 (-0.713)	-0.052* (-1.815)
<i>LEV</i>	0.284*** (5.120)	-0.277*** (-5.009)	1.498*** (3.813)
<i>SIZE</i>	-0.020*** (-2.579)	0.025*** (3.320)	-0.030 (-0.542)
<i>SHRCR1</i>	0.001 (1.299)	-0.001 (-1.197)	0.008 (1.644)
<i>ZINDEX</i>	0.000 (0.990)	-0.000 (-0.836)	0.006** (2.023)
<i>INDEPD</i>	0.259* (1.856)	-0.197 (-1.416)	0.694 (0.701)
<i>ROA</i>	-0.475*** (-2.784)	0.451*** (2.652)	-5.605*** (-4.634)
<i>PPE</i>	-0.009 (-0.176)	0.036 (0.709)	-1.446*** (-3.983)
<i>PIS</i>	-0.100* (-1.827)	0.094* (1.726)	-0.448 (-1.153)
<i>Industry/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0.534*** (3.063)	-0.447** (-2.572)	0.739 (0.597)
<i>N</i>	2517	2517	2517
<i>Adj. R²</i>	0.041	0.037	0.072
<i>F</i>	3.358	3.019	6.034

注：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修正的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性披露共存，而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性披露的本质差异在于动机与监管的效果争论（王艳艳等，2014）^[47]。前文已证实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有助于企业向地方政府寻租以获取更多的避税收益，那么企业是否会基于寻租动机而选择自愿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本文通过上交所和深交所网站以及公司网站手工收集是否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数据，并以此为标准将样本区分为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组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组。从表 5 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强制性披露样本组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CSRQUA*）与所得税实际税负（*ETR1*）、适用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TRD*）以及总税负的实际税率（*ETR2*）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但是，在自愿性披露样本组中，社会责任信息质量（*CSRQUA*）与所得税实际税负（*ETR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系数为 -0.113，显著性水平为 5%），与适用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TR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系数为 0.069，显著性水平为 10%），与总税负的实际税率（*ETR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系数为 -0.001,显著性水平为 1%)。这些回归结果表明,对于自愿披露的企业而言,提高信息质量明显有助于降低实际税负,而对于强制披露的企业而言,信息质量的提高对实际税负没有明显的影响。这意味着自愿披露的企业有强烈的寻租动机,即通过主动披露高质量的信息向地方政府寻租以获取政府在税收执法上的放松,从而实施更加激进的避税行为。而被要求强制披露的企业并没有明显的意愿利用提高信息质量来获取避税收益。这种差异反映出自愿披露以及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不同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和经济后果。假设 H₃ 得到验证。

表 5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基于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性披露的分析

变量	强制性披露			自愿性披露		
	ETR1	TRD	ETR2	ETR1	TRD	ETR2
CSRQUA	-0.232 (-1.335)	0.221 (1.269)	0.044 (1.626)	-0.113 ** (-2.444)	0.069 * (1.874)	-0.001 *** (-5.067)
GROW	0.014 (0.605)	-0.013 (-0.575)	-0.001 (-0.879)	-0.010 *** (-2.970)	0.009 *** (2.967)	-0.002 (-1.629)
LEV	0.254 *** (2.675)	-0.231 ** (-2.454)	-0.018 (-0.909)	0.194 *** (4.910)	-0.137 *** (-3.508)	-0.057 *** (-4.627)
SIZE	-0.028 * (-1.766)	0.037 ** (2.383)	0.003 (0.995)	0.007 (0.996)	-0.001 (-0.113)	0.013 *** (5.421)
SHRCR1	0.001 (1.564)	-0.001 (-1.238)	0.000 (1.318)	0.001 * (1.724)	-0.001 (-1.497)	0.000 (0.957)
ZINDEX	0.000 (0.181)	-0.000 (-0.183)	-0.000 * (-1.876)	0.001 (1.554)	-0.000 (-1.045)	0.000 (0.333)
INDEP	0.403 ** (2.501)	-0.336 ** (-2.111)	0.066 ** (2.111)	0.082 (0.738)	-0.033 (-0.298)	-0.014 (-0.411)
ROA	-0.702 ** (-2.087)	0.701 ** (2.082)	0.491 *** (3.438)	-0.263 * (-1.891)	0.201 (1.454)	0.415 *** (9.745)
PPE	0.059 (0.865)	-0.028 (-0.413)	-0.024 ** (-2.395)	-0.059 * (-1.726)	0.056 * (1.648)	-0.021 ** (-2.035)
PIS	-0.145 * (-1.733)	0.141 * (1.679)	-0.017 (-0.655)	-0.081 ** (-1.998)	0.086 ** (2.140)	0.024 * (1.898)
Industry/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810 ** (2.106)	-0.875 ** (-2.281)	-0.063 (-1.009)	0.054 (0.353)	-0.016 (-0.107)	-0.170 *** (-3.624)
N	1284	1284	1284	1233	1233	1233
Adj. R ²	0.032	0.032	0.105	0.079	0.044	0.172
F	7.542	3.947	11.98	10.51	5.611	23.92

注: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差修正的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

2.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实际税负: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

前文的理论分析认为,相比国有产权企业,私有产权企业有更强的寻租动机,即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向地方政府寻租以获取更多的避税收益。为此,本文将对假设 H₄ 进行实证检验。本文

通过追溯公司的控制链条,按照实际控制人的产权性质来定义国有产权企业和私有产权企业。通过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产权样本组和私有产权样本组进行分组回归检验。表6反映了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在不同产权性质样本组中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国有产权企业样本组中,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CSRDIS)与企业实际税负指标(ETR1/TRD/ETR2)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但是,在私有产权企业样本组中,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CSRDIS)与企业实际税负指标(ETR1/TRD/ETR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2、0.010、-0.004,且都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表6的结果表明,相比国有产权企业,私有产权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向政府寻租获取了更多的避税收益。

表6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实际税负: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

变量	国有			私有		
	ETR1	TRD	ETR2	ETR1	TRD	ETR2
CSRDIS	-0.009 (-0.165)	-0.001 (-0.017)	-0.001 (-0.485)	-0.012*** (-2.622)	0.010** (2.251)	-0.004** (-2.073)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222 (1.183)	-0.171 (-0.911)	-0.069*** (-3.033)	0.240*** (3.192)	-0.116 (-1.555)	-0.047** (-2.107)
N	5140	5140	5140	6071	6071	6071
Adj. R ²	0.004	0.004	0.073	0.010	0.004	0.065
F	8.310	5.354	22.57	19.74	8.251	37.96

注: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修正的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因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资料来源:本文通过Stata软件计算

表7反映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在不同产权性质样本组中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国有产权企业样本组中,社会责任信息质量(CSRQUA)与企业实际税负的三个指标(ETR1/TRD/ETR2)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而在私有产权企业样本组中,社会责任信息质量(CSRQUA)与企业实际税负指标(ETR1/TRD/ETR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8、0.042、-0.001,且均在1%或10%的水平上显著。表7的回归结果表明,私有产权企业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越高,实际税负越低,所获的避税收益越大,而国有产权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并没有显著的避税效应。这意味着私有产权企业积极地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向政府寻租,从而获取避税收益。实证结果支持假设H₄。

表7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

变量	国有产权企业			私有产权企业		
	ETR1	TRD	ETR2	ETR1	TRD	ETR2
CSRQUA	-0.271 (-1.592)	0.252 (1.479)	0.0114 (0.866)	-0.058*** (-3.921)	0.042* (1.724)	-0.001*** (-4.719)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790** (2.405)	-0.778** (-2.380)	-0.046 (-1.561)	0.052 (1.424)	-0.137* (-1.808)	-0.035 (-0.479)

续表 7

变量	国有产权企业			私有产权企业		
	<i>ETR1</i>	<i>TRD</i>	<i>ETR2</i>	<i>ETR1</i>	<i>TRD</i>	<i>ETR2</i>
<i>N</i>	1578	1578	1578	1010	1010	1010
<i>Adj. R²</i>	0.035	0.034	0.195	0.077	0.066	0.111
<i>F</i>	6.929	4.225	38.03	8.309	6.518	12.54

注: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修正的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显著;因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资料来源: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

3.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实际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分析

政治关联强化了政企间“投桃报李”的关系。一旦建立了政治关联,政企之间更加了解对方的需求和意图,政府会给予这类企业更多的回报,企业为了维系这种关系也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因此,政治关联的存在强化了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向政府寻租以获取避税收益的倾向。为此,本文将对假设 H_5 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通过以下方法定义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如果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曾)担任各级党委和政府官员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为有政治关联,否则为无。由于国有产权企业“天然”地具有政治关联,且国有产权企业的经营并不单纯地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目前涉及到政治关联的实证研究都以私有产权企业为研究样本(贾明和张喆,2010^[48];罗党论和魏翥,2012^[49];李姝和谢晓嫣,2014^[50]),本文亦遵从该做法。表 8 和表 9 列示了按照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来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表 8 反映了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在不同样本组中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有政治关联样本组中,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CSRDIS*)与企业实际税负指标(*ETR1/TRD/ETR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54、0.052、-0.006,且都在 1% 或 5% 的水平上显著,而在无政治关联样本组中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CSRDIS*)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这表明,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加积极地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向政府寻租以获取避税收益。表 9 反映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在不同样本组中对实际税负的影响。从表 9 中可以发现,在有政治关联样本组中,社会责任信息质量(*CSRQUA*)与企业实际税负的三个指标(*ETR1/TRD/ETR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405、0.377、-0.002,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而在无政治关联样本组中,社会责任信息质量(*CSRQUA*)的回归系数几乎都不显著。表 9 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越高所获得的避税收益越大,即对政府需求的迎合程度越高,政府回报给企业的避税收益越高。实证结果支持假设 H_5 。

表 8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实际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分析

变量	有政治关联			无政治关联		
	<i>ETR1</i>	<i>TRD</i>	<i>ETR2</i>	<i>ETR1</i>	<i>TRD</i>	<i>ETR2</i>
<i>CSRDIS</i>	-0.054 *** (-3.273)	0.052 *** (2.627)	-0.006 ** (-2.171)	0.003 (0.596)	-0.006 (-0.985)	-0.006 (-0.658)
<i>Control Variable</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0.037 ** (2.373)	-0.286 (-1.479)	0.111 *** (3.824)	0.350 *** (5.890)	-0.145 ** (-2.380)	0.074 (0.929)

续表 8

变量	有政治关联			无政治关联		
	<i>ETR1</i>	<i>TRD</i>	<i>ETR2</i>	<i>ETR1</i>	<i>TRD</i>	<i>ETR2</i>
<i>N</i>	1749	1749	1749	4322	4322	4322
<i>Adj. R²</i>	0.171	0.037	0.252	0.309	0.070	0.112
<i>F</i>	13.77	2.647	23.23	30.88	5.162	8.719

注: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修正的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显著;因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资料来源: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

表 9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分析

变量	有政治关联			无政治关联		
	<i>ETR1</i>	<i>TRD</i>	<i>ETR2</i>	<i>ETR1</i>	<i>TRD</i>	<i>ETR2</i>
<i>CSRQUA</i>	-0.405 *** (-2.970)	0.377 *** (2.803)	-0.002 *** (-3.252)	-0.086 * (-1.850)	-0.080 (-0.969)	0.014 (0.676)
<i>Control Variable</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1.036 *** (2.733)	-0.986 *** (-2.636)	0.0482 (1.350)	0.121 (0.662)	-0.037 (-0.194)	-0.085 (-1.196)
<i>N</i>	291	291	291	719	719	719
<i>Adj. R²</i>	0.135	0.141	0.371	0.281	0.132	0.485
<i>F</i>	2.928	3.093	13.18	5.527	2.152	13.35

注: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修正的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显著;因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资料来源: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

五、拓展分析:企业为了降低税负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是值得的吗?

基于前文的分析可知,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获取了地方政府的回馈,即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那么,企业选择这种方式来降低实际税负是否值得呢?为此,本文进一步从经济后果的角度探讨这种行为的合理性。本文将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变量(*CSRDIS*和*CSRQUA*)、企业实际税负变量(*ETR1*、*TRD*和*ETR2*)及其两者的交互项对企业价值(*TOBINQ*)进行回归^①,以检验这种行为最终是否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托宾 Q 值能够反映市场对于公司未来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的期望,因此,选择该指标衡量企业价值^②。回归结果如表 10 和表 11 所示。从表 10 中可以看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变量(*CSRDIS*)的系数全部在 1%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是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的,企业实际税负变量(*ETR1*/*TRD*/*ETR2*)的系数也基本显著,表明实际税负越高企业价值越低,其中,最关键的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实际税负的交互项(*CSRDIS* × *ETR1*/*CSRDIS* × *TRD*/*CSRDIS* × *ETR2*)系数,它们的系数均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对企业实际税负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起到了正向的调节

① 考虑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本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变量做了滞后一期处理。

② 具体计算方法为年末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份占净资产的金额、长期负债以及短期负债之和除以企业总资产。

作用,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弱化了企业实际税负上升对于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而且从回归系数的大小上来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变量(*CSRDIS*)的系数与交互项(*CSRDIS* × *ETR1*)的系数之和(0.145 + 0.429 = 0.574)大于企业实际税负变量(*ETR1*)的系数绝对值(| - 0.068 |),这也说明,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给企业价值带来的正向效应超过了实际税负增加给企业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①。同样,在表 11 中也能够得到相似的结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CSRQUA*)的系数全部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的交互项的系数也基本在 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披露高质量的信息削弱了实际税负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这些结论从经济后果的角度反映出企业采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方式来向地方政府换取税负的降低是值得的。

表 10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实际税负:经济后果分析

变量	(1)	(2)	(3)
	<i>TOBINQ</i>	<i>TOBINQ</i>	<i>TOBINQ</i>
<i>CSRDIS</i>	0.145 *** (3.174)	0.082 ** (2.410)	0.126 *** (3.096)
<i>ETR1</i>	-0.068 * (-1.673)		
<i>CSRDIS</i> × <i>ETR1</i>	0.429 ** (2.130)		
<i>TRD</i>		0.058 (0.712)	
<i>CSRDIS</i> × <i>TRD</i>		0.084 * (1.710)	
<i>ETR2</i>			-0.780 *** (-9.151)
<i>CSRDIS</i> × <i>ETR2</i>			0.820 ** (2.109)
<i>Control Variable</i>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14.844 *** (43.222)	14.900 *** (43.518)	14.756 *** (43.261)
<i>N</i>	8103	8103	8103
<i>Adj. R²</i>	0.555	0.554	0.559
<i>F</i>	295.5	295.3	300.8

注: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修正的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显著;因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资料来源: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

① 换用其他变量也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如表 10 和表 11 所示。

表 11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经济后果分析

变量	(1)	(2)	(3)
	<i>TOBINQ</i>	<i>TOBINQ</i>	<i>TOBINQ</i>
<i>CSRQUA</i>	0.708 *** (3.554)	0.686 *** (3.447)	0.668 *** (3.367)
<i>ETR1</i>	-0.502 ** (-2.160)		
<i>CSRQUA × ETR1</i>	0.158 * (1.727)		
<i>TRD</i>		0.140 (0.636)	
<i>CSRQUA × TRD</i>		0.014 (0.216)	
<i>ETR2</i>			-0.880 *** (-2.946)
<i>CSRQUA × ETR2</i>			0.259 ** (2.586)
<i>Control Variable</i>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10.227 *** (19.876)	10.135 *** (19.675)	9.961 *** (19.333)
<i>N</i>	2110	2110	2110
<i>Adj. R²</i>	0.480	0.479	0.482
<i>F</i>	161.1	160.4	162.7

注：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修正的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显著；因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资料来源：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

六、结论与启示

自 2006 年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的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法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呈几何式增长。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展现出了“遵纪守法、负责任、有担当”的正面形象。然而，本文基于 2009 - 2015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均呈负相关，而且相对强制披露，自愿披露的信息质量与实际税负的关系更强。这意味着中国的一些上市公司存在“言行不一”的现象，即企业一面积极地公开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而另一面却暗中从事避税行为。本文结合中国的转轨经济背景，基于寻租理论来解释这种看似“言行不一”的现象：在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以及当前的社会氛围下，企业利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作为一种寻租工具，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政治寻租，从而获取租金，即能够从事更加激进的避税行为。进一步结合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背景，检验了国有产权企业和私有产权企业在披露

社会责任信息的避税效应上是否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有无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避税效应是否存在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产权企业,私有产权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避税效应更显著;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避税效应更加显著。这表明,在中国的二元所有制结构下,私有产权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寻租以获取避税收益的倾向更加严重,政治关联的建立进一步加深了企业的这种寻租倾向。最后,从经济后果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借助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获取避税收益是否值得。研究发现,披露社会责任不但本身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而且明显削弱了企业税负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说明这种行为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

本文的启示如下: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转型经济阶段,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迎合政府需求目的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更为广泛,使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逐渐成为一种较为隐蔽的寻租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避税行为这两种“相悖”行为的并存之谜,即企业可以通过主动地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迎合地方政府的政治或社会需求,地方政府则“投桃报李”地通过放松税收执法力度来帮助企业降低实际税负进行利益输送。中国特殊的二元所有制结构以及政治关联的普遍存在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现象及其效果。这种现象扭曲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初衷,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更损害了社会公共福利水平。只有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对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和约束,才能从根源上让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真正成为市场驱动的产物,使其动机从政治寻租回归为向利益相关者寻利。

参考文献

- [1] Tullock. G. The Economics of Special Privilege and Rent Seeking[M].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 [2] Slemrod. J., and S. Yitzhaki. Tax Avoidance, Evasion, and Administration [M].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 North Holland: Elsevier, 2002.
- [3] Chen, S., X. Chen, Q. Cheng., and T. Shevlin.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95, (1): 41 - 61.
- [4] Hanlon, M. and S. Heitzman.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50, (2 - 3): 127 - 178.
- [5] 范子英, 田彬彬. 税收竞争, 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3, (9): 99 - 111.
- [6] 陈冬, 孔墨奇, 王红建. 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 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6, (5): 46 - 63.
- [7] 李增福, 汤旭东, 连玉君. 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之谜[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6, (9): 136 - 148.
- [8] Lanis. R, and G. Richards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ax Aggressiven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2, 31, (1): 86 - 108.
- [9] Hoi. K., Q. Wu., and H. Zhang. I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ssociated with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Irresponsible CSR Activitie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 (6): 2025 - 2059.
- [10] Krueger. 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 Seeking Socie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64, (3): 291 - 303.
- [11] 黎文靖. 所有权类型, 政治寻租与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一个分析性框架 [J]. 北京: 会计研究, 2012, (1): 81 - 88.
- [12] Detomasi. D. The Political Roo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 82, (4): 807 - 819.
- [13]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7, (7): 36 - 50.
- [14] Shleifer. A., and R. Vishny. Politicians and Firm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 (4): 995 - 1025.
- [15] 周黎安, 陶婧. 政府规模, 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9, (1): 57 - 69.
- [16] Fan. H., J. Wong., and T. Zhang.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Case of State-owned Corporate Pyramids [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013, 29, (6): 1217 - 1252.
- [17] Qian, Y., 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 (5): 1143 - 1162.
- [18] Jin. H., Y. Qian., and R. Wein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 (9 - 10): 1719 - 1742.
- [19] Li. H., and L.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0):1743-1762.

[20]王立彦,刘向前. IPO 与非法定公司所得税收优惠[J]. 北京:经济学(季刊),2004,(2):457-474.

[21]Cremer,H.,and F. Gahvari. Tax Competition and Tax Evasion[J]. Nordic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93,(11):89-104.

[22]郭杰,李涛. 中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北京:管理世界,2009,(11):54-64.

[23]Dubin. J., M. Graetz., and L. Wilde. The Effect of Audit Rates on the 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Tax,1977-1986[J]. National Tax Journal,1990,43,(4):395-409.

[24]Slemrod. J., M. Blumenthal., and W. Christian. Tax Payer Response to an Increased Probability of Audit: Evidence from a Controlled Experiment in Minnesot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1,79,(3):455-483.

[25]张茵,刘明辉,彭红星. 社会信任与公司避税[J]. 北京:会计研究,2017,(9):48-54.

[26]Reverte. C. Determina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Rating by Spanish Listed Firm[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9,88,(2):351-366.

[27]宋林,王建玲,姚树洁. 上市公司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基于合法性视角的研究[J]. 北京:经济管理,2012,(2):40-49.

[28]刘想,刘银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考察[J]. 北京:经济学动态,2014,(11):49-64.

[29]权小锋,吴世农,尹洪英. 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价值工具或自利工具?[J]. 北京:经济研究,2015,(11):89-97.

[30]Jenny. 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The Communication Challenge[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2005,9,(2):108-119.

[31]宋献中,龚明晓. 公司会计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研究——基于内容的专家问卷分析[J]. 北京:管理世界,2006,(2):104-110.

[32]吴联生. 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J]. 北京:经济研究,2009,(10):109-120.

[33]邓建平,曾勇. 金融关联能否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J]. 北京:金融研究,2011,(8):78-92.

[34]Godfrey. C.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Shareholder Wealth: A Risk Management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4):777-798.

[35]李四海,李晓龙,宋献中. 产权性质、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政治寻租视角的分析[J]. 济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162-169.

[36]Cai, H., and Q. Liu.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J]. Economic Journal,2009,119,(537):764-795.

[37]李元旭,宋渊洋. 地方政府通过所得税优惠保护本地企业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1,(5):149-159.

[38]吴文锋,吴冲锋,芮萌.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J]. 北京:管理世界,2009,(3):134-142.

[39]田利辉,张伟. 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J]. 北京:经济研究,2013,(11):71-86.

[40]李维安,徐业坤. 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J]. 北京:金融研究,2013,(3):114-129.

[41]Kim. F., and L. Zhang. 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ax Aggressivenes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6,33,(1):78-114.

[42]Dyreg. D., M. Hanlon., and L. Maydew. The Effects of Executives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0,85,(4):1163-1189.

[43]刘行,叶康涛. 企业的避税活动会影响投资效率吗?[J]. 北京:会计研究,2013,(6):47-53.

[44]魏春燕. 审计师行业专长于客户的避税程度[J],北京:审计研究,2014,(2):74-83.

[45]Clarkson. M. 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1):92-117.

[46]刘慧龙,吴联生. 法制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J]. 北京:管理世界,2014,(4):42-52.

[47]王艳艳,于李胜,安然. 非财务信息披露是否能够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基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研究[J]. 北京:金融研究,2014,(8):178-191.

[48]贾明,张喆. 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J]. 北京:管理世界,2010,(4):99-113.

[49]罗党论,魏翥.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广州:南方经济,2012,(11):29-39.

[50]李姝,谢晓嫣. 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 天津:南开管理评论,2014,(6):30-40.

Disclosur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tual Tax Burden: Walking the Talk or Logging Rolling?

ZOU P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ie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mainly focus on the stakeholder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ese enterprises. These studies only put the government as a stakeholder who get the tax revenue, but neglect the influence of system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n the enterprise behavior. Using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 2015 as research sample, we find that the CSR disclosure exert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corporate actual tax burde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CSR disclosure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decrease of corporate actual tax burden, especially if the enterprises disclose the CSR voluntarily. We further fi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decrease the actual tax burden more aggressively by disclosing the CSR, and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enhances the effect of CSR disclosure on corporate actual tax burd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nies are ostensibly disclos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actively, while secretly avoiding tax. This contradictory behavior means that companies' disclosur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is not entirely motivated by altruistic motives, but may be otherwise. The rent-seeking theory provid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o this behavior. The rent-seeking theory holds that government's regula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 makes various forms of rent, which leads to enterprises' rent seeking (Krueger, 1974).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s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 strong tendency and power to intervene in the market. Chinese companies are born in thi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government behavi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ince 2006 the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CSR disclosur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CSR disclosure is no longer the result of autonomic behavior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and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will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can meet the government's demand by actively disclos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give back to the enterprise by relaxing tax law enforcement to reduce the actual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the CSR disclosu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ols for rent-seeking, which helps enterprises to obtain rent which is the reduction of actual tax burden. Moreo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dual ownership system,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a more serious rent-seeking tendency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develop. Compared with the enterprises without political connection, the enterprises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 also have a more serious rent-seeking tendency in order to maintain political conne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implications as follows. First, it analyzed the motivation of CSR disclo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nt-seeking, and full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on corporate behavior. Second,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coexistence of CSR disclosure and tax avoid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cs,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between them. Thirdly, it has enrich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ourth,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regulatory and motivation, which is increasingly taken seriously by the government.

China's economy is still in a st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becaus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CSR disclosur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ubtle means of rent-seeking, which partly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of coexistence of CSR disclosure and tax avoidance behavior. This phenomenon distort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CSR disclosure, undermines the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and damages the level of public welfare. Only speeding up the pace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ver local government and related departments, can make the CSR disclosure become the product of market-driven.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actual tax burden; rent-seeking; property rights; political connection

JEL Classification: D22, M14, H26

DOI: 10.19616/j.cnki.bmj.2018.03.010

(责任编辑:刘建丽)